



第三讲 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 人口社会学思想

桂世勋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学置于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他们论述人口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许多观点，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人口社会学指明了正确方向。然而，现代的各种人口社会学思想由于其不同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并不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而随之都变成科学，其中有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有些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有些甚至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我们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人口社会学思想，才能正确评价和对待现代的各种人口社会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有关人口社会学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有关人口社会学的思想，主要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和《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1年2月1日）》、列宁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及《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和《做革命的促进派》等著作中阐明的。归纳起来，他们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人类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虽然具有一般动物所共有的自然属性，但人类同“狭义的动物”又有本质区别。这首先在于人类能够从事生产劳动，改造自然界，创造出合乎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而人类要进行生产活动，就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归根到底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他们能否获得以及能够获得多少生活资料，固然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但直接取决于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或阶级关系）的性质。同时，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也对人类的生产活动有各种反作用。可见，人类和动物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存在着本质区别，人类是通过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从事生产活动才取得生活资料的。其次，人类和动物的增殖条件也有本质区别。人是社会的人，人类的生育总是通过一定的婚姻家庭关系来实现的，因而人类的增殖不仅表现为自然关系，而且表现为社会关系，是两性的生育现象和婚姻家庭关系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由于一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又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并受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教育、伦理道

德、医疗卫生等社会条件影响的,所以,人类的增殖决不象动物的繁殖那样单纯是一种超社会、超历史的自然现象,而是在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制约的、一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下进行的。

因此,任何离开一定的生产方式及其它许多社会条件来孤立地分析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科学的。

(二)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规律。随着资本积累必然产生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有计划地调节人口的增长。

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针对他把人口规律说成是与社会生产方式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鼓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大量失业是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等谬论,详尽地阐述和论证了随着资本积累必然产生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并强调指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这就使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大批工人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相对人口过剩规律才能退出历史舞台,工人失业的社会根源才能根本消除。以后,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当时俄国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时,毛泽东同志在批判艾奇逊鼓吹中国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即使共产党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时,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原理。

可是,现在有些人鉴于南斯拉夫失业问题和我国当前大量待业青年的存在,便否认上述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出现人口相对过剩的现象,但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相对过剩有着本质区别:一是具体含义和性质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是劳动人口相对于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而过剩,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是劳动人口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过剩。二是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失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不协调而造成的。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来说,它不仅不需要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而且要求尽力解决相对过剩人口。三是解决的根本途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根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计划地调节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搞好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相对人口过剩并不具有必然性。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恩格斯曾提出过一些光辉思想。他在1881年给考茨基的信中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能“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毫无困难地”“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应当”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将会由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人们自己来决定。毛泽东同志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个思想,明确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为我们揭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方向,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三) 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及其变化虽然不能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但它能够促进或延缓社会的发展,影响各种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人口对社会发展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影响作用。即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问题,恩格斯仍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增殖快慢对失业人口的多少有一定的影响。他在谈到德国俾斯麦时代比法国拿破仑第三时代失业人数“大得多”的原因时曾指出:“这部分地是由于我国同只生两个孩子的法国相比人口增殖得要多多得多”。特别是恩格斯后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把“人类自身的生产”包括在“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内,作为历史发展中“归根结蒂”的“决定性因素”,进一步强调了人的生产的重要性。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则明确指出:“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的这种影响作用,毛泽东同志则在1957年就生动地讲过,我国人口增加太多将会给国家在安排小孩子、安排工作、解决吃饭、交通运输、以至逛公园等许多方面带来很大困难,并主张我国“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

“新人口论”、“人口爆炸论”和“适度人口论”

现代国内外有关人口社会学思想是比较多的。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几种观点:

(一) “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是我国马寅初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提出出来的人口理论。它因马老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新人口论》而得名。

“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是:“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人口迅速增长必然同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增产粮食、增加工业原料和设备、提高人民生活之间存在着矛盾,“影响工业化”;因此,我们必须“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

在“新人口论”中,马老不仅具体阐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而且对人口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作了很多分析。他在说明为什么我国从1953年至1957年间人口增长率很可能在20%以上时,列举了许多社会因素对人口出生与死亡的影响。其中影响人口出生增多的社会因素有:解放后“大家都有职业”,“经济情况改善”,“促使结婚人数增加”;“旧思想的残余”如“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到处传播”;解放后“尼姑与和尚大半还俗结婚”,“妓女也没有了,多了许多生孩子的人”等。至于影响人口死亡减少的社会因素则有:解放后“国内秩序空前安定”,“人民死于非命的减少”;解放后“孕妇、产妇、儿童有许多优待,乡村都有新法接生,小孩死的少了”;解放后“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退休有养老金”,“老年人死亡率减少了”等。正是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马老一面强调了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一面指出了要有效地控制我国人口数量,“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每个人“都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同时国家应“干涉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实行以避孕为基础的计划生育。

“真金不怕火炼”。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尽管在五十年代末遭到了错误批判,被打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然而以后我国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新人口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我国国情的卓识远见。当然,如同许多新的思想在刚提出时并不是完美无

缺的一样，“新人口论”中的个别说法也有欠妥之处，如在强调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时，认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在强调避孕的重要性时，认为“人工流产”是“杀生”等。但这影响不了“新人口论”基本思想的正确，它完全可以通过贯彻“双百”方针更趋完善。

（二）“人口爆炸论”。

“人口爆炸论”是二次大战后国外很流行的一种人口理论。它的代表作是美国的保罗·凡·伊里奇在七十年代初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

“人口爆炸论”的主要观点是：“世界行将人口爆炸，人类灾难就要来临”；“人口爆炸”来自第三世界；“人口爆炸”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它将“威胁世界和平”；因此，要解决发展中国家贫穷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推行“家庭计划”和依靠超级大国给予“经济援助”。

“人口爆炸论”在人口与社会问题关系上的主张是十分错误的。它完全否认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贫穷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推行侵略政策、掠夺政策和战争政策，严重地摧残了这些国家的生产力，而认为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是人口过多，说什么“正是由于人口爆炸，使穷国的发展停滞不前，使穷国与富国疏远，使两者之间已经达到危险的差距加大。”从这点出发，“人口爆炸论”便鼓吹推行“家庭计划”、节制生育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上具有根本意义，并起主要作用。可见，即使都主张要节制生育，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社会学同“人口爆炸论”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学说。正如列宁在《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无产阶级尽管也“拥护传播有关避孕方法的医学著作”，“要求无条件废弃一切惩罚堕胎的法律”，但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社会学说是根本对立的两回事。

“人口爆炸论”在总体上是荒谬和反动的。不过它所引用的有些人口统计资料对我们研究世界人口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要求推行“家庭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和利用。

（三）“适度人口论”。

“适度人口论”是本世纪初和二次大战后国外非常流行的人口理论。它的代表作是英国经济学家艾德温·坎南在1914年出版的《财富》和法国人口学家阿·索维在五十年代出版的《人口通论》。

“适度人口论”的主要观点是：在一定条件下，国家（或地区）能够保证其中特定标准或指标达到最高水平所需要的那种人口数量，称为“适度人口”，否则，便是人口“不足”或“过剩”；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人口达到适度，就可获得“按人口平均的最高收入”，一切政治经济问题以至整个社会面貌都会焕然一新；为了确定适度人口的数量或人口适度增长率，应该从经济、文教卫生、生态等许多因素和许多方面进行研究。

在人口与社会的关系上，“适度人口论”的主要问题是宣扬人口决定论。有的“适度人口论”者认为，“适度人口”是能“最令人满意地保证实现”“强壮、长寿、健康、文化、国民收入、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等一定目的的人口。他们从如何保证最良好的就业状况，如何保证人口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生活构成的质量提高，如何保持生态平衡等各方面来预测若干时期后的适度人口，说什么只要达到了适度人口，许多社会问题就能完满地得到解决。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社会问题，虽然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

率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由其社会制度造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不可能真正达到“适度人口”，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实现“适度人口”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对国外的“适度人口论”，我国人口学界在过去的很长时期内持全盘否定态度。现在看来，其中还是有合理部分，值得借鉴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及其增长趋势，探讨若干年后的适度人口和在这期间的人口适度增长率，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有可能逐步实现的。国外的“适度人口论”者在预测适度人口时所考虑到的某些相关因素和所运用的数理统计、计算机处理等方法，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参考的。近年来，我国有些人口学者借鉴了“适度人口论”，运用了一些现代的预测方法，从自然资源可能提供的生活资料、从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及工农业劳动者人数今后可能的增长速度和比例、从保持生态平衡等角度来预测我国100年后的理想人口，即适度人口，得出了7亿左右为好。虽然这种研究还是初步的，但它对科学地制定我国的人口政策，搞好计划生育，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上接第69页）

消费者转化为生产者；从壮年到老年，是从生产者又转化为单纯消费者。幼年这个消费阶段的消费，是对其劳动报酬的预付，这预付的价值是整个社会、包括自己的父母在内创造出来的；当从单纯消费者转化为生产者的时候，又面临着比上一代优越得多的劳动条件，这条件也是整个社会、包括自己的父母创造出来的；当父母由生产者转为单纯消费者的时候，也并不是“白吃饭”，这一消费阶段的消费是对其劳动报酬的补付。乘凉不忘种树人，喝水不忘挖井人。因此，尊重父母，就是尊重劳动，尊重历史。

3、要看到老年人对社会、对家庭仍旧能发挥重要作用。俗话说：“老马识途”。古代的管仲说过：“老马之智可用也”。事实正是这样。而且，老人在家庭中也不是一个“累赘”，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家庭的许多职能中，老人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教育孩子、照料家务、排难解忧，以至于经济上的帮助、重大问题上的商量决策等，都会给青年人以很大的帮助。

现在，有些青年人对父母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父母收入较丰，则都想从父母处捞一些好处；父母收入菲薄，则踢出门去不管；争房子、争财产，闹得不亦乐乎。有时妻子只顾赡养自己的父母，却不许男方赡养他的父母等等，这都是要加以教育和纠正的。

敬老爱老，是我们国家优良的传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古人“幼有所养，老有所终”的理想才能真正变成现实。一些外国友人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的老人和儿孙在一起欢度天伦之乐，十分羡慕，十分感慨，说这种情况在西方已经很少了。在西方，子女成家立业后，往往就和父母分开了，关系十分淡泊。因此，我们要珍视我国这种优良传统，永远保持良好的父子关系。